

# 外国文学函授教材

第六期

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北京·1985

# 外国文学函授教材·第六期目录

## 1. 外国文学史

### 第六编 文艺复兴时期或十六世纪的欧洲文学

前 言	张 驰 ( 1 )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	吕同六 ( 2 )
第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文学	郑克魯 ( 16 )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	陈 悤 ( 26 )

## 2. 比较文学

( 四 ) 平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刘象愚 ( 46 )
------------------	------------

## 3. 外国文学思潮和流派

象征主义	张英伦 ( 51 )
------	------------

## 4. 外国文学名著选讲

《傲慢与偏见》中的财产关系琐谈	朱 虹 ( 58 )
-----------------	------------

## 5. 外国美术知识

第六章 中世纪美术	李 春 ( 61 )
-----------	------------

## 6. 外国电影知识

别具一格的印度电影文化	肖 模 ( 68 )
-------------	------------

## 7. 通知 ..... ( 72 )

主办：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 第六编 文艺复兴时期或 十六世纪的欧洲文学

### 前 言

张 驰

在度过了大约一千年漫长的中世纪时期以后，从十四世纪开始，欧洲许多国家先后步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十六世纪史学家的理解，文艺复兴指的是以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为高峰的欧洲古代文化的复兴。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后来扩展到德、法、英、西、荷等欧洲其他国家。从整个欧洲着眼，这一运动达到普遍极盛的时期在十五至十六世纪，特别是十六世纪。而到了十七世纪，以法国最为突出的古典主义文学高度兴盛，欧洲文学从整体上说又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另外，欧洲也有部分国家未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直接影响。根据这一情况，为兼顾这部文学通史的欧洲部分总的步调和各国文学史分期的相对协调和完整，本单元对欧洲各国文学史的分期作了灵活的处理。原则是以十六世纪末为本编的下限。这样，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史都基本保持了它们的完整性；而象德国，文艺复兴运动在那里绵延至十七世纪较晚些时候，我们就将其十七世纪部分归入下一单元；至于俄国和东欧，它们的中世纪历史直到十七、十八世纪方告结束，已在本文学史的中世纪部分加以介绍，又大体未受文艺复兴运动的直接影响，就不在本单元涉及。

从十四世纪开始，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

发展等多种原因，资本主义关系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世纪统治着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是封建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就必须以反映本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文化去击破基督教文化的统治。渗透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自然成为它的有力武器。人文主义强调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最高的善是现世的幸福生活，重视科学和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和享受；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平均发展。它与基督教的宗教观、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以继承和弘扬古典文化传统为己任的文艺复兴运动便应运而生。文艺复兴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一般的文化变革的范畴，它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的成就首先在于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会所谓上帝创造世界的信条以致命的打击；伽利略在物理学、数学方面的发明使人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在地理方面的发现为地图说提供了不可辩驳的证据……正如

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时自然科学的一些伟大成就“本身便是彻底革命的”，因为它们有力地促进了人的精神解放。

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精神领域首先推动了哲学思想的解放。唯物主义逐渐取得对基督教神学的胜利，理性逐渐代替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突出的结果是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和无限的潜力，从而把个性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奉为美好的生活理想。这就是人道主义亦即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精髓。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艺术在欧洲出现过普遍的高度繁荣。但是，文艺复兴正发生于各个国家民族意识觉醒，人民强烈渴望民族统一，而且民族语言的文学和民族风格的艺术正在发展的时期，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文学艺术在不同的国度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同。艺术方面，在意大利，以乔托、波提切利、芬奇、拉斐尔、提香为代表的绘画，以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雕刻，以帕莱斯特里那、拉索为代表的音乐，盛极一时；在英国，戏剧艺术有长足的进展。文学方面，尽管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共同的核心，各国又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在意大利，但丁这位“中世纪的最后一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语），以其梦幻文学形式的巨著《神曲》给中世纪文化以艺术的总结，同时也透露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彼特拉克的爱情诗

冲破了宗教世界观和禁欲主义的羁绊，表达了以人与现世生活为主体的新的世界观和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欧洲抒情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薄伽丘以短篇故事集《十日谈》批判天主教会和僧侣阶级，讴歌现世生活，表达了市民阶级摆脱中世纪教会和宗教束缚的要求。在法国，拉伯雷以长篇讽刺小说《巨人传》无情地谴责封建国家机器、天主教会和经院教育，通过对德廉美修道院的描写提出了人文主义的正面理想；七星诗社和《随笔集》的作者蒙田分别在诗歌和散文方面达到高度成就。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英国文学以莎士比亚为最高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在他的戏剧中得到最充分和深刻的反映。西班牙以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和维加的戏剧引为骄傲，它们形象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衰落时期的社会现实，暴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宣传了人文主义思想。而德国则以民间文学和讽刺文学见长。

百花繁茂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对于传播新思潮、加速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新旧交替的进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也是诗歌、戏剧、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在艺术上全面趋于成熟和完美的阶段，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

吕同六

### 第一节 概述

文艺复兴运动，是十四至十六世纪发源于意大利，随后席卷欧洲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对人类历史的进步，对世界文学艺术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十四至十六世纪，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

期。意大利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意大利地处欧、亚、非的交通要道，对外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十一至十三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发动的八次大规模的十字军远征，就是以意大利为基地。十字军远征，大大沟通了意大利同东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它的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据记载，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从十二世纪传入意大利，从而使它的丝织业获得繁荣，不久意大利丝绸的声誉仅次于中国，畅销西欧和中东各国。意大利的金融业和海运业也迅速发展，在欧洲居首位。意大利的银行在欧洲许多国家开设分行，到十四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两家银行甚至向英国国王提供大量贷款。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出现了新兴的城市平民阶级，即最初的市民阶级。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它的北部和中部，成立了若干城邦。以世俗的封建主和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虽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仍占据统治的地位，但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同阻碍它发展的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已经水火不容了。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展开了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文艺复兴便是这一场政治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

文艺复兴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突出地表现在反对教会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成为它的精神支柱。同时，教会主宰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全部文化，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神学中。哲学成了神学的奴仆，文学只是“圣者”的言行录，史学沦为寺院的编年史。因此，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把矛头指向教会，必然要批判以反动的宗教神学为中心的世界观。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积极

兴办世俗的学校，努力发展城市世俗文化，打破了教会长期垄断教育的局面。世俗学校开始设置“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针锋相对的世俗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其内容包括对古希腊、罗马学术和语言、文学、自然科学的研究。“人文主义”这个称谓由此而来。

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在希腊罗马作品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新世界——古代世界灿烂辉煌的文化，它同中古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典文化是一切世俗文化的精华，而意大利在接受这古典文化遗产方面有着特别优越的条件，因为意大利是古罗马的直接继承者，意大利文化、意大利语同罗马文化、拉丁语一脉相承。因而他们最早的活动是广泛搜集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予以翻译、整理，进行研究。在他们的推动下，掀起了搜寻古代文籍、收藏图书和建立图书馆的热潮。

然而，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并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在文艺复兴时代，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具有新的现实意义。人文主义者以新时代的眼光，注释和阐述古典著作，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新的挖掘，从中吸取思想上的营养。人文主义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阐发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同封建力量、教会进行激烈斗争的理论武器。因此，人文主义很自然地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

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传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物之本，向基督教神学提出挑战，否定神权，否定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权威。所以人文主义有时又称作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提出个性解放的要求，肯定人的伟大，肯定现实生活，认为人有享受尘世幸福和爱情的权利，否定教会鼓吹的人生是

苦难的来世思想和爱情是罪恶的禁欲主义。

人文主义批判中世纪对科学、文化的摧残，反对蒙昧主义，推崇理性，提倡学习文化，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全面地发展个人才智。

由此不难看出，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继承和利用古典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发动的一场革命；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体系，批判中世纪的文化和世界观，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要求，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一扫中古时期象征的、梦幻的文学的死气沉沉的局面，把资产阶级诞生时期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和理想，热爱祖国和现实生活的巨大激情，倾注于文学领域，给文学带来了蓬勃的生机，涌现出了许多灿烂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最杰出的代表，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他们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第二节 但丁

但丁·阿里盖利（1265—1321），欧洲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的伟大诗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

1265年5月下旬，但丁诞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关于他的家庭情况，传留下来的资料不多。据但丁自己在《神曲》里透露，他是古罗马人的后裔，他的高祖是个贵族，曾经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侵，因为立了战功，受到骑士的封号。他的父母据说当过法庭的文书，家道已经中落，实际上等同于一般市民。

但丁五六岁的时候，母亲病故，大约十八岁的时候，父亲逝世。他少年时代生活很困苦，便把全部精力倾注于学习。他得到当时著名学者拉丁尼的精心指导，后来又勤

奋自修，对于拉丁语、诗学、修辞学、古典文学、伦理学、哲学、神学、历史、天文、地理、音乐、绘画无不研究。他潜心攻读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的诗卷，在“智慧的海洋”里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他还在修道院里旁听过课程。这样，但丁在中古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获得的精深的造诣，成为一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这对他日后的社会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丁的一生几乎是在社会各阶级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中度过的。在但丁生活的年代，他的故乡佛罗伦萨已是意大利最繁荣的手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市民阶级同封建贵族激烈斗争的中心。这种斗争和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在圭尔弗党同吉伯林党的斗争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十三、四世纪，意大利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城邦林立，形成封建割据，城邦之间斗争激烈，战乱频仍。“帝国的花园荒芜丁”。这就为教会势力的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教皇以太上皇自居，竭力干涉世俗政治，图谋攫取国家权力。

但丁青年时代就加入代表市民阶级的圭尔弗党，以巨大的热忱和毅力，从事政治斗争。1300年，他当选行政长官，为佛罗伦萨共和政权的建设呕心沥血。他不顾教皇博尼法齐乌斯八世的种种威胁，坚决反对教皇干涉内政。1302年，代表教会的黑党夺取了佛罗伦萨的权力，以反对教皇和所谓贪污的罪名，判处但丁终身流放。

近二十年漂泊无定的流放生涯，使但丁广泛接触到意大利平民阶层困苦的生活和意大利动乱的现实。

呜呼，奴隶的意大利，  
痛苦的温床，  
你是暴风雨中失去舵手的孤舟，  
你不复是各省的主妇，  
却沉沦为娼妓！

他更加热爱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热爱故乡佛罗伦萨。他深深懂得，“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

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断然拒绝以宣誓忏悔为条件，来取得赦免，重返家园。因此，1315年，佛罗伦萨统治者又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判处死刑。

诗人的身世际遇和政治阅历，使他强烈地感受到社会脉搏的跳动，体验到人民心头的期望与憧憬，加深了对意大利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

为了有益于在邪恶中生活的尘世，  
你返回人间后  
要写下你看见的情景。

这是但丁借贝娅特丽丝之口，表达他创作《神曲》的目的，实际上也是诗人一生文学创作的宗旨。

但丁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新生》（1292—1293），写于流放以前，共收三十首抒情诗，用散文连缀。诗人抒发对青年时所爱恋的女子贝娅特丽丝的纯洁、热烈的感情，诗中虽然带有中古文学的宗教神秘色彩，但洋溢着对生活和幸福的渴望，体现出挣脱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意愿。诗歌清新自然，开文艺复兴抒情诗的先河。

流放初期，但丁写了三部著作。《飨宴》（1304—1307），是意大利第一部用俗语写成的学术性论著，它打破了中世纪学术著述必须使用拉丁语的规矩。但丁借注释自己的诗歌，向群众介绍古今科学文化知识，提供精神食粮，故名《飨宴》。原计划写十五篇论文，但只完成四篇。书中虽然宣传了经院哲学，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但又强调只有理性才使人区别于禽兽，使人高贵，接近上帝；赞颂人的伟大，指出只要具备人文主义思想，“人的高贵”就“超过天使的高贵”；批判封建等级观念，强调人的高贵在于个人的美

德，不在于门第，“不是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

和《飨宴》几乎同时写作的《论俗语》（1304—1305），是最早的一部关于语言学、诗律的著作，用拉丁语写成。但丁对意大利语言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辟的论述，着重批判中世纪推崇拉丁语的偏见，阐发俗语（从拉丁语脱胎而来的早期意大利语）的优越性，提出把它作为意大利文学、科学的语言，并强调了作家在民族语言形成中的作用。这部著作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还肯定“人具有用理智判断的能力，寻求理性的东西”，因而是“独立的”，主张诗歌要歌颂人，歌颂人的安全、爱情和美德。

《帝制论》（1310—1312）是但丁撰写的一部政治性论著。他运用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阐明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是使人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全部才能，享受尘世的和平与幸福；认定尘世生活有其自身的价值，不受教会宣扬的来世永生的支配，现实生活与来世天国是并行不悖的。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在于，但丁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政治和宗教平等，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的观点，向神权说提出英勇的挑战，闪动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芒。但书中也流露出对王权和开明君主的幻想。

经过长期酝酿和精心构思，大约在1307年前后，但丁开始创作伟大的史诗《神曲》。《神曲》全诗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共一百歌，计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三行。《地狱》、《炼狱》大约完成于1313年，《天堂》在他逝世前不久脱稿，历时十余年。《神曲》采用中古时期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以但丁自己为主人公，叙述他三十五岁那年，在一个黑暗的森林迷路，黎明时来到一座洒满阳光的小山脚下，忽然三只野兽（象征淫欲、强暴、贪婪的豹、狮、狼）张牙舞爪，迎面扑来。这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

了，他受贝娅特丽丝的委托，引救陷入迷途的但丁，并引导游历地狱和炼狱。地狱的形状仿佛一个大漏斗，凡九层，罪人的灵魂按生前罪孽的大小，接受不同的惩戒。第一层是生前没有接受洗礼的古代异教徒，在等待上帝的裁判。第二层，犯贪色罪的灵魂，在冰雹的打击下发生凄惨的呼号。第三层，犯饕餮罪的灵魂，深陷在泥坑里，听任狂风暴雨的袭击。贪婪和挥霍无度的灵魂，在第四层地狱互相辱骂、撕打。第五层是一潭污水的恨湖，生前忿怒的灵魂，光裸着身子，彼此用头相撞，用牙相咬，直到皮开肉烂。第六层，邪教徒在烈火燃烧的坟墓里哀号。第七层，暴君、暴徒和生前施行暴力的灵魂，遭受火雨和热沙的煎熬。地狱的第八层分成十条恶沟，生前惯于欺诈的灵魂，如诱奸者、阿谀者、圣职买卖者、伪君子、窃贼、放高利贷者，在这里接受各种最严酷的刑罚。地狱最下的一层是冰湖，卖国卖主的叛徒都冰冻在湖里。炼狱（又称净界）分七级，加上净界山脚和山顶的地上乐园，共九层。生前犯有过错，但可以得到宽恕的灵魂，按人类七大罪过（傲慢、忌妒、忿怒、怠惰、贪财、貪食、貪色），分别在那里忏悔自新，一层层升向光明和天堂。在地上乐园，贝娅特丽丝接替维吉尔，引导但丁游历天堂，经过九重天，到达上帝面前。

《神曲》充满了寓意，有些象征手法隐晦费解。然而，这部长诗的主旨是异常明确的。诗人立志要写一部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反映苦难的现实，启迪人心，表现人类如何由迷误经过苦难的磨炼，达到真和善。也就是说，诗人要为处在除旧布新时代的意大利寻求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

《神曲》艺术地表现了陈旧的中世纪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这两个时代的冲突，氤氲着在新时代内部凝聚和跃动的新思想。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丁在长诗中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尖锐地抨击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专横，对当时意大利四分五裂，“祸起萧墙，同室操戈”，民不聊生的混乱现实深恶痛绝。他把意大利比作“苦难的住所”，“境内没有一块干净的和平土地”，它象一艘在暴风雨中飘荡的“孤舟”，失去了“舵手”；罗马仿佛一个落难女子，“孤苦伶仃，流着泪，日夜呼号”。他对“意大利所有的城市都充满了暴君”，对意大利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予以强烈的谴责。但丁既对鱼肉人民的豪门贵族、贪官污吏，重利盘剥的高利贷者提出了严峻的批判，同时又义正词严地对给意大利带来祸害的法国卡佩王朝后裔那不勒斯国王等人的恶德败行，给予猛烈的抨击。

对反动宗教神学的严正批判，对教会僧侣阶级腐败的无情揭露，构成了《神曲》的主旋律。但丁痛斥教会“日夜在那里用基督的名义做着买卖”，从事买卖圣职、敲诈勒索、图谋私利的无耻勾当，他们“把金钱当作上帝”，“使世界陷入悲惨的境地，把好人踩在脚下，把坏人捧在头上”。但丁义愤填膺地指出，这班僧侣满口仁义道德，其实早已背弃《圣经》教义，他们“把圣殿变成了兽窟，法衣也变为装满罪恶面粉的麻袋”，他们不啻是一群“披着牧羊人衣服的贪婪的豺狼”。诗人对镇压佛罗伦萨共和政权，在意大利制造动乱与分裂，企图建立神权政治的教皇博尼法齐乌斯八世尤为深恶痛绝，他把其他贪婪的教皇、主教、教士置于地狱第四层接受惩罚，却把当时还在世的博尼法齐乌斯八世预先打入地狱第八层，头脚倒栽在深穴里，接受火刑。

同时，但丁进一步发挥在《帝制论》中阐述的政教分离的思想。他用“两个太阳说”，形象、生动地说明，政权与教权之间应当是独立与平等、分工与合作的关系：

造福世界的罗马，向来有

两个太阳，分别照明两条路径，  
尘世的路径，和上帝的路径。

教权入侵政权的结果，世界“遭了殃”，连教会也“跌入泥潭，玷污了自己和承担的责任”。但丁又把国家比喻为骏马，皇帝是骑手，教皇是门外汉，要求尽快恢复由骑手来指挥马匹的正常局面。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但丁在《神曲》中表述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摆脱中世纪教会束缚和宗教神学桎梏的愿望，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但丁以澎湃的热情，歌颂现世生活的意义，歌颂人赋有的自由意志。他认为，自由意志乃是上帝“最伟大的杰作”，上帝给予人类的“伟大的赠品”；因此，人应当十分珍惜自由意志和理性，并在现实中坚定不移地遵循它们：“你随我（指象征理性的维吉尔）来，让人们去议论吧！要象高塔一般，任凭狂风呼啸，塔顶都永远巍然不动。”但丁还鼓励世人积极投身现实的斗争，以历史上具有伟大理想和坚强意志的英雄豪杰为榜样，振奋精神，“避开怠惰”，“战胜一切艰难”，去创造自己的命运。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世俗爱情。这种以人为本，重视现实生活价值的思想，显然同中世纪一切归于神的观念，同教会宣扬的来世主义、禁欲主义，都是针锋相对的。

对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对于教会排斥和否定古典文化的荒谬态度，但丁在《神曲》中同样给予有力的批判。他赞美人的才能和智慧，呼吁发展文化，对古典文化和希腊、罗马学者表示了高度的崇敬；他称呼罗马诗人维吉尔为“导师”、“智慧的海洋”，把他选为游历地狱和炼狱的向导。他在《地狱》篇中，以热忱的笔调，颂扬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在求知欲的推动下，离开家庭，抛弃个人幸福，历尽千难万险，扬帆于天涯海角的事迹，并通过奥德修指出：人“不能象走兽一般活着，应当追求美德和知识”。

但丁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新兴市民阶级。他在《神曲》中对这个阶级的贪婪私利，追逐金钱，对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罪恶，予以严厉的谴责。他指出，资产阶级暴发户充满了“骄狂傲慢和放荡无度之风”，“骄傲、嫉妒和贪婪是三颗星火，使人燃烧起来”。

《神曲》反映的上述种种思想，构成了但丁作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特征。

但丁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伟大思想家、诗人，基督教神学观念、中世纪思想的偏见和世界观上的种种矛盾，自然也在《神曲》中得到了表现。他歌颂现世生活，但又把它看作是来世生活的准备。他揭发教会和僧侣阶级的秽行劣迹，但又并不整个地反对宗教和教会，甚至还把神学置于哲学之上，信仰置于理性之上，说谁“希望用我们微弱的理性，识破无穷的玄妙，真是非愚即狂”。他批判禁欲主义，但又把追求自由爱情的一对青年恋人弗朗齐丝嘉和保罗作为贪色的罪人放在地狱里接受惩戒，把苦行禁欲派始祖圣芳济谷置于天堂。但丁对封建皇帝也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认为只有皇帝才能够保障祖国统一、独立与自由的实现。因此，但丁又给亨利七世预先在天堂里准备了一个荣耀的位置。但丁批判封建统治下混乱的现实，但作为对比，又把封建宗法时期的佛罗伦萨美化为田园诗般恬静、纯朴的社会。这一切，也正是但丁思想上消极的一面，是他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的世界观的鲜明反映。

《神曲》的伟大历史价值在于，它通过对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堂过程中遇到的上百个各种类型人物的描写，以广阔的画面，反映出意大利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和各个领域发生的社会、政治变革，透露了新时代的新思想——人文主义的曙光。这部长诗对中古政治、哲学、科学、神学、诗歌、绘画、文化，作了艺术

性的阐述和总结。因此，《神曲》不仅由于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达到了时代的先进水平，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且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状况，传授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

《神曲》是一部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的作品。但丁描写的地狱、炼狱、天堂，不象中古文学作品中那样模糊不清，虚无飘渺，而是结构严密，布局精细，层次清晰，具有立体感。在描绘不同的境界时，诗人采用不同的色彩。地狱是惩戒罪孽的境界，充满痛苦和失望，色调幽凄、阴森；炼狱是悔过和希望的境界，色调柔和、宁静；天堂是至善至美的境界，色调灿烂、光明。

但丁擅长刻画物态，常常以丰富而新颖的艺术想象，在戏剧性的场面中，描绘出种种惊心动魄的、神奇的景象，刻画出人物外形的和性格的特征。在诗人的笔下，常常只寥寥数笔，地狱里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如判官冥罗思，三个狗头的恶犬猪拜罗，狄司城的复仇女神，灰树林的妖鸟，长着三副不同颜色的面孔、三对翅膀的地狱魔王撒旦，便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他们不只具有各个不同的、高度写实的艺术形象，而且烘托了地狱各个特定环境的气氛。

但丁在刻画人物、描写场景和细节的时候，善于运用生动而贴切的比喻。用“眼睛象宝石脱落的指环”，形容人之枯槁、憔悴，可谓入木三分。《地狱》末尾描写卖国卖主的叛徒，身子没在冰湖里，面色发青，牙齿战栗作声的样子，但丁巧妙地把他们比喻为夏天的青蛙，没在沼泽里，露出头部，呱呱地叫唤。又如，地狱里的幽灵没有身躯，失去了血肉，但丁在描写他们登上阿凯隆渡河的船只时形容道：“好比秋天的黄叶，从树枝上一片片落到地上。”

在语言上，但丁摒弃中古文学作品使用的拉丁语，用意大利俗语写作《神曲》，并采用以民间诗歌中流行的一种格律为基础的三

韵句，在整个《神曲》中都严格地、自始至终地连锁押韵，从而赋予这部史诗优美的音乐感和运动感。《神曲》对丰富、提炼意大利文学语言，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都表明但丁摆脱了中世纪文学传统的羁绊，力图用新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新时代的思想内容。

《神曲》原名《喜剧》，后人为了表示对诗人的崇敬，给这部作品冠以“神”字，即《神圣的喜剧》。中译本通称《神曲》。

晚年，但丁受康格拉达·德拉·斯卡拉大公和圭多·诺维罗·波伦塔伯爵的邀请，先后在维隆纳、腊万纳客居。1321年9月13日，但丁因病在腊万纳逝世，时年五十六岁。

### 第三节 彼特拉克

弗朗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另一位先驱，杰出的抒情诗人。

彼特拉克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望族，著名的律师，因同黑党头头不和，与但丁同时被放逐。他自幼跟随父亲流亡法国，在普罗旺斯旅居多年。他少时便酷爱文学，但父亲有意让他当律师，因此他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博洛尼亚攻读法律。父亲逝世后，他便放弃法学，从事文学活动，并周游欧洲许多国家，到处观察生活，追求知识。彼特拉克曾在阿维农教廷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务。1330年至1347年间，断断续续地在红衣主教科伦手下任职。这样，他一方面同佛罗伦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有机会经常出入教会、宫廷。这种情况有助于他日后的人文主义活动。

彼特拉克学识渊博，对希腊罗马文化有精湛研究。他热心搜求古籍抄本，亲自抄录古典作品，发现了西塞罗等古典作家失传的书信和著作。他是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古典文化的最早代表。他把人和现实生活放在中

心地位，通过注释，阐述古籍，批判中古文化，宣传人情世道。他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他本人的创作，都发生了影响。

作为一个诗人，彼特拉克始终处在时代的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和创作。他同著名的共和主义者科拉·迪·利恩齐保持着亲密的友谊。1347年，利恩齐领导罗马平民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封建君主的统治，一度建立共和国。彼特拉克热烈欢呼这一革命行动，并挥笔写诗，奉献给利恩齐。

彼特拉克用拉丁语写了许多诗歌、散文。《秘密》(1342—1343)这部著作借圣奥古斯丁同诗人的对话，来批驳前者宣扬的尘世生活是罪恶，应该为上帝牺牲个人的禁欲主义观点，指出它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不符合实际。诗人热烈为爱情和荣誉辩护，认为爱情同热爱上帝，追求人间的幸福同追求永恒的幸福，是一致的。

著名叙事诗《阿非利加》的写作始于1338或1339年，但未完成。诗中叙述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古罗马统帅西皮奥战胜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的英雄事迹，歌颂罗马的伟大，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这首用拉丁语写成的长诗，使彼特拉克名扬四海。巴黎和罗马竞相邀请他去接受桂冠。1341年4月8日，彼特拉克在罗马卡匹托利山举行的仪式上，荣获桂冠诗人的称号。

《歌集》是彼特拉克的代表作。这部诗集用意大利语写成，主要是爱情诗，还有少量的政治抒情诗。相传诗人1327年在教堂遇到一个名叫劳拉的美丽少女，虽然没有更多的接触，但他一见钟情，以后便陆续写了三百多首十四行诗，抒发对她的爱慕。1347年，黑死病夺去劳拉的生命，诗人不胜悲痛，又写了一些表达哀思的抒情诗。彼特拉克继承普罗旺斯骑士诗歌和意大利“温柔的新体”诗派爱情诗的传统，创造了文艺复兴的抒情诗。旧的抒情诗在中古神学思想的影响下，

充斥隐晦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人物偶像化，缺乏血肉。彼特拉克跳出这一框框，在《歌集》里以多姿多彩的色调，描绘劳拉的形体的美和心灵的美，勾画出这位尘世少女的真实、动人的形象，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内心活动，使爱情诗不仅洋溢着浪漫的激情，而且比较接近现实。劳拉既是理想化的女性，又是真实、可爱的恋人；对劳拉的爱，使诗人体验到幸福和欣悦，又感受到失望和痛苦。劳拉实际上是当时人文主义者追求的人间美和爱的象征。这些诗歌大胆歌颂爱情，吐露对幸福的渴望，反映出人文主义者蔑视中世纪道德，热爱生活的新世界观。

彼特拉克的诗音韵典雅，结构严谨，常常借助自然景物的美来歌颂劳拉，用啁啾的飞鸟、潺潺的流水、温馨的花朵、簌簌的叶声，来传达诗人细微的感情，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采用ABBA ABBA CDC DCD，或ABBA ABBA CDC EDE的格式押韵。他使十四行诗这一新诗体臻于艺术上的完美。他的抒情诗，特别是十四行诗，为欧洲抒情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人为此把彼特拉克称为“诗圣”。

《歌集》中的长诗《我的意大利》，是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政治诗。彼特拉克时代的意大利，四分五裂，不断遭到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的侵扰。诗人引吭高歌，要用“我的歌声”，来倾诉祖国“深沉的悲愤”和“希望”。他谴责意大利各城邦的君主争权夺利，引狼入室，让意大利“美丽的身子受着致命的创伤”：

君主们，命运的宠儿，  
你们执掌治理锦绣山河的权柄，  
为什么竟然无动于衷  
任凭异族的刀枪杀戮生灵？  
容忍雇佣军用鲜血  
玷污碧绿如茵的大地？  
你们身陷虚荣的牢笼，

目光如豆，却兀自骄傲自尊，  
向狼心狗肺寻求友爱与忠诚。

诗人呼吁他的同胞挣脱“不堪承担的重负”，争取独立和统一：

美德一旦拿起武器，向野蛮宣战，  
胜利的日子不再遥远：  
古老的品德尚未泯灭，  
在意大利人心中永存。

在《歌集》的其他一些政治抒情诗里，彼特拉克还对教会进行抨击，指责它是“制造欺诈的工场，邪恶的策源地，活人的地狱”。

彼特拉克的一些散文、诗篇，特别是后期的诗歌，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诗人热爱生活，追求爱情，向往幸福，但又因中世纪的幽灵对他心灵的压迫而感到痛苦，不能从旧的道德观念的精神枷锁下彻底解放出来，有时甚至发生动摇，企图忏悔，这也反映了文艺复兴和中世纪两个时代的矛盾，反映了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

#### 第四节 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和但丁、彼特拉克并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杰”。

薄伽丘是一个佛罗伦萨商人和法国女人的私生子，1313年生于巴黎。但有的文学史家认为他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城契塔尔多。他幼年丧母，随父亲回到佛罗伦萨，在严父和后母的冷酷家庭中度过了童年。后来，他被父亲送到那不勒斯学习经商，毫无收获。父亲又让他学习法律，但无论是商业还是法律，都引不起他的兴趣。这段经历使他体验了市民和商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在他日后的《十日谈》中得到了反映。同时，薄伽丘有机会进入那不勒斯王罗伯特的宫廷，接触到贵族骑士的生活，并同人文主义者广泛交往，扩大了他的文化艺术视野。他在宫廷里认识了罗伯特的私生女玛丽娅，对她发生了爱情。这一段浪漫的经历，也在

他的文学创作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1340年，薄伽丘父亲的经济状况恶化，一蹶不振，薄伽丘无法维持原先悠闲的生活，便回到佛罗伦萨。在这个城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制。他参加了行会，曾担任管理财政的职务，多次受城市共和政权的委托，去意大利其他城市和法国执行外交使命。

薄伽丘潜心研究古典文学，成为博学的人文主义者，是当时西欧第一个掌握希腊文的学者。他翻译了荷马的作品，在翻译和注释古代典籍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他致力于《神曲》的诠释和讲解，他著的《但丁传》是意大利研究但丁的最早学术著作之一。他的另一部著作《神谱》以丰富的史料叙述神和英雄的起源，展示神话的现实基础。1375年，薄伽丘逝世于佛罗伦萨。

薄伽丘是位勤奋多产的作家。除《十日谈》外，还著有长篇小说、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论文。长篇小说《菲洛柯洛》（1335—1340），写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和一个青年异教徒的爱情故事，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十日谈》中有两则故事就是从这部小说中汲取的素材。《菲洛柯洛》是欧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史诗《苔塞伊达》（1339）、《菲洛特拉托》（1340），牧歌《亚梅托》（1341），长诗《爱情的幻影》（1342）、《菲索拉诺的女神》（1344—1345），长篇小说《菲娅美达》（1345），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奉献给作家青年时代的恋人玛丽娅。这些作品撷取古希腊、罗马诗歌的神话、传奇的题材，但又摆脱了俗套，讴歌纯洁的爱情，高尚的友谊，展示人世间生活的美和爱情的欢乐，谴责违反人情常理的禁欲主义，同时对人物充满激情的心理状态也比较注意刻画。其中，《菲娅美达》叙述一个被恋人抛弃的女子的遭遇，细致地描摹她的爱和怨、希望和痛苦，翘首盼望情人归来的心，堪称欧洲最早的心理小说。

薄伽丘最优秀的作品是《十日谈》(1348—1353)。1348年，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瘟疫，城市十室九空，居民死亡过半。瘟疫刚平息，薄伽丘即着手写作《十日谈》。这部故事集开头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黑死病肆行，三名男青年和七名少女在诺维拉教堂邂逅，一起到乡村一所别墅避难，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除了玩赏风景，欢宴歌舞，便开故事会。在其中的十天里，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总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

书中不少故事取材于历史事件、法国中世纪传说和东方民间故事(如《一千零一夜》、《七哲人书》)。薄伽丘把这些故事的情节移至意大利，予以再创造。人文主义思想一根红线贯穿这部故事集，但薄伽丘的思想又比彼特拉克更进了一步。他在许多故事里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天主教会和宗教神学，揭开教会神圣的面纱，把僧侣们奢侈逸乐、敲剥聚敛、买卖圣职、镇压异端等种种黑暗勾当，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则故事描写某个笃信犹太教的亚伯拉罕，亲自到意大利了解罗马教廷的情况，他到处观察，耳闻目睹，看到从教皇、红衣主教，直到神甫、修士，“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爱钱如命，贪得无厌，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教皇的驻地罗马已经“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亚伯拉罕十分惊诧，最后暗自得出结论，基督教充满罪恶、黑暗，可是反倒日益光大，肯定是上帝在支持它，于是毅然改信基督教。作者用这样犀利无比的笔锋，辛辣地嘲讽了教会的腐败堕落。

薄伽丘极端蔑视僧侣的奸诈和虚伪，无情地揭示出，僧侣们谴责教徒心中的淫念，是为了把那班罪徒吓跑，好让他们这班色中饿鬼去勾引良家妇女；他们谴责重利盘剥，为的是让高利贷者害怕被打入地狱，永劫不复，乖乖地交出不义之财，去填满他们的钱

袋。薄伽丘不止于揭露僧侣们是伪善君子、言行不一，他追根究底，揭示教会的反动教规是造成这一切的恶果。薄伽丘对教会的批判，表达了当时的城市平民阶级否定神权统治，挣脱宗教桎梏，自由发展的要求。

描写男女之间爱情的故事，在《十日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薄伽丘认为，中世纪鼓吹爱情是罪孽，宣扬神爱和天国幸福的禁欲主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是违反人性的。“在所有的自然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拦”，爱情使人具有高尚的情操，因此，神爱断然不能代替情爱，人有权享受爱情和来世幸福。有一则故事，描写一个简直似白痴的后生西蒙，任凭严父良师怎样开导，甚至鞭笞，都不成器，但在爱情的启发下，由“愚鲁一变而为聪颖”，“才艺出众”。作者用这样生动的例子表明，真正的爱情能够激发人蕴藏的才智和力量。薄伽丘还在许多故事里以巨大的热情，赞美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等级观念，蔑视金钱和权势，争取幸福的斗争，讥讽建立在经济关系上的婚姻。

《十日谈》还批评封建特权，维护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薄伽丘确信，人的高贵并不取决于出身，而是决定于人的才智，即便是伺候国王的马夫，同国王相比，也毫不逊色。不少故事叙述，在争取幸福的斗争中，出身微贱的人往往以自己的智慧、毅力，战胜封建主和贵族。薄伽丘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贫穷不会磨灭人的高贵的品质”，穷人家往往出现圣贤人，倒是“富贵叫人丧失了志气”，帝王家子弟只配放猪牧羊。薄伽丘还摒弃中世纪僧侣主义污蔑女人代表罪孽的陈腐观念，赞美妇女是自然的美妙造物，主张妇女应该享有跟男人平等的地位。

关于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在《十日谈》里也得到体现。在薄伽丘看来，人应当接受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和谐发展，既健康、俊美，又聪明、勇敢。这体现了文艺复

兴时期对于人的理想。

《十日谈》中的一些故事过于渲染情欲和庸俗的趣味，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生观。一些“英雄故事”显得矫揉造作，宣扬顺从、宽容，贬低现实生活，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对中世纪道德观念的让步。

《十日谈》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薄伽丘以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通过叙述故事，概括生活现象，描摹自然，刻画心理，塑造了国王、贵族、骑士、僧侣、商人、学者、艺术家、农民、手工业者等不同阶级、不同行业的、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展示出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抒发了文艺复兴初期的自由思想。《十日谈》是一部故事集，薄伽丘别出心裁地采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巧妙地串连起来，使之浑然一体，成为一部思想上、艺术上都异常完整的作品。《十日谈》以古典文学名著为典范，又吸取民间口语的特点，语言精炼、流畅，又俏皮、生动，描写事件和人物，微妙尽致。它开创了短篇小说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为意大利艺术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日谈》问世以后，薄伽丘写了短篇小说《大鸨》，借用中古文学的梦幻形式，诅咒爱情，贬斥女人。在旧势力和教会的威胁、围攻下，他甚至想把《十日谈》付之一炬。这是新旧时代的矛盾使他苦恼和动摇的表现。

《十日谈》出版后，风行西欧各国。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纳瓦尔的《七日谈》，都是摹仿《十日谈》之作。德·维加、莎士比亚、莱辛、歌德、普希金等都在作品中引用过它的故事。

### 第五节 其他作家和作品

从十四世纪起，意大利出现了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诗歌、短篇小说、喜剧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成就，推动

了人文主义的传播。人文主义在文学、诗学、史学、科学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城邦的君主竞相招贤，把诗人、艺术家、学者迎进宫廷。佛罗伦萨的君主洛伦佐·德·梅迪契（1449—1492）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在他的宫廷中形成了一个人文主义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波利齐亚诺（1454—1494），他博学多识，曾翻译荷马史诗《伊利昂记》。他的抒情诗格律严谨，或表现游乐庆典，或吟颂爱情和青春。《比武篇》系为庆祝洛伦佐的弟弟比武胜利而作，描叙神话中的维纳斯王国和狩猎的场面，展示自然和艺术的美，是音韵优美的田园诗。

另一位受到梅迪契家族庇护的诗人浦尔契（1432—1484），写了著名长诗《摩尔干提》（1483）。浦尔契采用骑士传奇的题材，以骑士罗兰的冒险和查理大帝的征战为线索，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以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巨人摩尔干提的形象。浓郁的市民文学的格调，诙谐而生气盎然的情趣，对自由信仰的追求，体现了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思想。

十五世纪另一部长篇传奇叙事诗《热恋的罗兰》（1483），系为费拉拉城邦艾提斯家族服务的诗人博亚尔多（1441—1494）所作。长诗以查理大帝同回教徒的战争为主线，糅合了罗兰的爱情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笔墨粗犷有力，歌颂骑士式的爱情，流露出对骑士制度没落的依恋之情。

萨凯蒂、班戴洛是薄伽丘之后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萨凯蒂（约1330—1400）的代表作《故事三百篇》，约写于1385至1392年间，但仅传留下来223篇。作者把目光投向佛罗伦萨的商人、平民、艺人和手工业者，叙写他们的日常生活际遇、趣闻轶事，多侧面地描绘出十四世纪意大利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的景象。这些作品短小精粹，每篇往往不足千字，堪称“小小说”。故事采用平民的口头语言，淳朴自然，俏皮有趣。

班戴洛（1485？—1561）一生共写了短篇小说214篇，凡四卷，分别于1554、1573年出版。他把小说作为传播和赞美重大事件的手段，其题材或来源于古代史料、中世纪传说，或采自前人文学作品、当代生活的奇闻、轶事，不注重深刻的心理描写，而以曲折的、传奇式的情节取胜。班戴洛的小说对意大利和欧洲发生很大影响。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洛佩·德·维加、缪塞的喜剧和塞万提斯的小说，都从他的一些小说中汲取素材。

吉拉尔迪，别名饮齐奥（1504—1573），主张描写惊心动魄的、残忍的、罪恶的事件，以此达到歌颂善行美德的目的。他的《百篇故事》在欧洲广泛流传，莎士比亚的《奥瑟罗》即取材于书中的《威尼斯的摩尔人》。

此外，马苏乔（约1410—1480）的《故事集》，费伦佐拉（1493—1543）的《谈爱篇》，格拉齐尼（别名拉斯卡，约1503—1584）的《晚宴集》，斯特拉帕马拉（？—1587）的《欣悦的夜晚》，都具有题材丰富多姿，生活画面广阔，故事引人入胜的特点，为短篇小说万紫千红的园地增添了绮丽灿烂的景色。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喜剧的繁荣，是以马基雅维利、阿利奥斯托和阿雷蒂诺的创作作为标志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位政治学家、历史家，他在文学领域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写过诗歌。短篇小说《混世魔王贝法哥尔》，以纵横恣肆的笔墨，对蔑视妇女的传统观念予以嘲讽。他曾翻译和改编古罗马喜剧。喜剧《曼陀罗花》（1518）是马基雅维利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作者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辛辣地抨击不懂得生活和爱情的学究丈夫的迂腐、荒唐，教士的邪恶、卑鄙。剧中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风格夸张、幽默。它继承古罗马喜剧的传统，为以后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

阿利奥斯托的喜剧《列娜》、《巫术师》

等，用诗体写成，仿效古罗马喜剧，但剧中贯串着人文主义思想，叙述爱情和家庭关系，颂扬平民百姓，揶揄贵族富人，反映了社会的世态习俗。

阿雷蒂诺（1492—1556）用散文写了五部喜剧，一部悲剧。《御马长官》、《妓女》、《伪君子》、《哲学家》等，以明快的格调，塑造大臣、学者、骗子、妓女、仆人、军士、青年等三教九流的人物形象，暴露出当时现实的阴暗。这些喜剧的成就不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而在于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马基雅维利、阿利奥斯托和阿雷蒂诺的喜剧互相辉映，是文艺复兴时期喜剧的珍品，为意大利民族喜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是以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创作终结的。

阿里奥斯托（1474—1533）写过短诗、喜剧，但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是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1502—1532）。长诗共四千八百余行，情节上承接博亚尔多的《热恋的罗兰》，以查理大帝的骑士罗兰同安杰丽嘉的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穿插基督徒同回教徒的战争和其他骑士的爱情、冒险经历，构成一幅气势恢宏、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阿里奥斯托的旨趣不在叙述传奇，而在抒发人文主义思想。他以优美的笔触，描绘大自然和生活的美，歌颂爱情是人的自然的、高尚的感情，造就英雄业绩的源泉，赞赏不同宗教信仰的青年男女克服艰难险阻，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批判宗教偏见和禁欲主义扼杀人性和爱情。长诗充溢着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谴责侵略者的蹂躏和封建君主的割据给意大利带来的祸害，要求给予意大利自由、和平与统一。诗人对罗兰由爱恋而失恋以致发疯的过程和复杂的心理变化，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细腻入微，层次清晰。叙事和抒情、悲剧和喜剧的因素，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疯狂的罗兰》为欧洲叙事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塔索（1544—1595）写过抒情诗、牧歌剧，他的代表作是《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这部长诗计二十歌，以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为背景，叙述布留尼统帅十字军东侵小亚细亚，围困和攻占回教徒统治下的圣城耶路撒冷。诗中贯穿了另外两条线索：十字军骑士唐克雷蒂同回教徒女战士克罗琳达的爱情，十字军将领里纳尔多同回教徒魔女阿尔米塔的恋爱。塔索倾力歌颂现世生活，礼赞爱情对宗教的胜利，使这部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异教精神的巨著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但另一方面，诗人又赞美十字军东侵的胜利，肯定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教会镇压异端和反对宗教改革的要求。《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形象地反映出塔索思想上、创作上的深刻矛盾，也表现了人文主义的危机，它鲜明地打上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走向衰落时代的印记。

## 第六节 文艺理论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文艺理论的研究十分活跃，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最初的人文主义者，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在宗教的旗帜下，驳斥教会诗歌的污蔑，肯定诗歌的价值，探讨诗歌创作的特点。

但丁的文艺思想，散见于他的学术著作《飨宴》、《论俗语》和史诗《神曲》。他对诗的语言、诗的本质、诗的题材、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精辟的阐释。但丁认为，诗歌“必须使用最光辉的语言”，写得“合乎韵律”，“讲究修辞”；诗歌应当反映“最高贵的事物”，即安全、爱情和美德（《论俗语》）。但丁指出，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善与美的关系，它们即有区别，又相一致。他强调诗在字面的意义之外所具有的寓言性或象征性，也即初级的形象思维。（《飨宴》）

但丁在《神曲》中还阐述了诗歌创作的现

实主义原则，提出“艺术要尽量模仿自然”的主张。他对意大利抒情诗的发展进行总结时，又进一步指出，诗歌还应该表现人的内心生活、精神世界，批评了西西里诗派一味摹仿普罗旺斯抒情诗，追求形式的美的倾向。

但丁的文艺观是人文主义思想曙光在文艺理论领域最早的闪现。

薄伽丘的杰作《十日谈》也包含对文艺创作原则的重要论述。薄伽丘指出：自然是天地万物之母，艺术应逼真地模仿自然；作家要注意故事细节的真实，重视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功能。在《但丁传》、《异教诸神谱系》中，薄伽丘在宗教的旗帜下，批判中世纪神学对文艺的污蔑，指出诗是虚构的故事，隐藏着最深刻的思想，具有摹写自然，激荡心灵的作用；要求诗人善于运用想象，重视艺术技巧，还应熟悉生活，掌握渊博的知识。

后来，达·芬奇、阿尔贝蒂、吉拉尔迪、卡斯特尔韦特罗、瓜里尼、塔索等，对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对艺术创作的原则、题材、体裁、独创性、典型性等问题，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多才多艺的巨人，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他在《绘画论》、《笔记》两部著作中，深入地探讨了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达·芬奇认为，认识起源于实践，知识的获得依靠直接的观察和经验。他强调艺术要模仿自然，艺术家应该诉诸丰富多姿的自然，准确地再现自然，做“自然的女儿”。他主张艺术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认为艺术作品不只是应该象“镜子”一样反映事物，而且应该以思考为指导，从自然中观察和选择比较优美、有价值的部分，加以表现，同时表现人物独特的性格和思想，即“心灵”。达·芬奇认为，群众对自然最了解，因而他们是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价值的权威检验者。他还对绘画、诗歌、音乐的特点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抑诗扬画的

观点，给后人进一步探讨各个艺术品的区别和不同的表现效果，提供了借鉴。

阿尔贝蒂是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师，诗人、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数学家。他较早地提出了艺术创作的典型化问题。他指出，艺术家不必拘泥于机械地模仿真实的人物，而应力求再现“一般的人”，并进而刻画人物的“全部与众不同的特征”。

阿里奥斯托的传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问世以后，在意大利触发了一场围绕亚里士多德诗歌理论的辩论。吉拉尔迪相继写了《论喜剧和悲剧的创作》（1543）、《论传奇体叙事诗》，参加论战。他批驳保守派的论点，指出传奇体叙事诗是新的、不同于古典英雄史诗的体裁，它不应该受亚里士多德制定的规章的约束，不能局限于描写单一的情节，而应该用古人不知道的方式和现代语言创作。他还对诗与历史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历史家的职责是“只写真正发生过的事迹，并且按照它们真正发生的样子去写”，而诗人写事物，“并不是按照它们实有的样子，而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去写”。吉拉尔迪的这一重要观点，在他的同时代人卡斯特尔韦特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卡斯特尔韦特罗（1505—1571）是文艺复兴时期有创见的文学批评家，曾因异端罪被宗教裁判所缺席审判。他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在《诠释》里探讨了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他强调诗同历史、哲学的区别：诗人的任务不是被动、机械地再现现实，而是按照逼真的原则，凭借想象、虚构，描述有代表性的事件；诗必须富有独创性；它以娱乐为目的。卡斯特尔韦特罗关于情节、时间、地点一致的论述，为后来古典主义“三一律”理论的形成，打下一定的基础。

塔索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他的长篇英

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发表以后，有的批评家竭力贬抑，塔索于是作文辩护，并在《论诗的艺术》（1567）、《〈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辩护》（1585）、《论英雄史诗》（1595）等篇中，进而对诗的真实性、典型性和诗的社会功能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发。塔索认为，英雄史诗的题材应取自历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同时又应该富于想象，艺术上新颖、独特；要把逼真和惊奇两者和谐地结合起来。他还指出，史诗应该注意艺术概括，不是单纯按照事物已有的样子去摹写，而是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表现；不是局限于个别的事的真实，而是注意带有普遍性的事的真实。

在戏剧理论领域，瓜里尼作出了重要贡献。瓜里尼（1538—1612）是文艺复兴晚期的诗人、剧作家。他写的剧本《忠实的牧羊人》（1585），大胆地把悲剧和喜剧的体裁结合起来，遭到保守势力的攻讦，因而撰写了《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1601）。他在文中指出，戏剧是现实的反映，人物的写照；悲喜混杂剧毫不违反生活和艺术常规，它兼备悲剧和喜剧的优点，而抛弃它们的缺点，是一种形式和结构完美的诗；它可以同时描绘伟大人物和卑贱人物。当时，莎士比亚写了悲喜混杂剧《量罪记》，西班牙德·维加发表了《当代编剧的新艺术》，宣传这一新体裁，悲喜混杂剧开始在欧洲流行。这一新体裁的创作和围绕它的论战，给十八世纪严肃剧奠定了基础，在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上颇有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重大成就，是对古希腊、罗马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大大丰富了西方文艺理论宝库，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和欧洲各国文艺理论的发展。